

东南亚
研究丛书
DONGNANYA
YANJIU CONGSHU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世界四大文化 与东南亚文学

SHIJIESIDA WENHUA YU DONGNANYA WENXUE

梁立基 李谋◎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东南亚
研究丛书

DONGNANYA
YANJIU CONGSHU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世界四大文化 与东南亚文学

SHIJIIE SIDA WENHUA YU DONGNANYA WENXUE

梁立基 李谋◎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 / 梁立基, 李谋主编.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7.1
ISBN 978-7-5192-2182-9

I. ①世… II. ①梁…②李… III. ①文学研究
—东南亚 IV. ①I33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8011号

-
- 书 名 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
(SHIJIE SIDA WENHUA YU DONGNANYA WENXUE)
- 主 编 梁立基 李 谋
- 策划编辑 刘正武
- 责任编辑 魏志华
- 装帧设计 林穗晓
-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 地 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 邮 编 510300
- 电 话 (020) 84451969 84184026 84459579
- 网 址 <http://www.gdst.com.cn/>
- 邮 箱 wpc_gdst@163.com
- 经 销 新华书店
- 印 刷 广州市德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 印 张 22.5
- 字 数 330千字
-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 国际书号 978-7-5192-2182-9
- 定 价 5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出版社联系)

咨询、投稿: 020-84460251 gzlw@126.com

导 论 / 1

第一编 中国文学与东南亚文学 / 27

第一章 概述 / 28

第二章 中国与东南亚的神话传说 / 37

第一节 中国神话的源流 / 37

第二节 中国对东南亚神话传说影响的途径 / 40

第三节 中国与东南亚神话传说的比较 / 44

第三章 越南的汉语文学 / 52

第一节 越南汉语文学的出现与发展 / 52

第二节 早期的越南汉语文学 / 54

第三节 与喃字文学并存的汉语文学 / 57

第四节 越南语拉丁化文字出现后的汉语文学 / 63

第四章 越南的喃字文学 / 67

第一节 喃字的产生和喃字文学的发展 / 67

第二节 喃字文学的代表作家与作品 / 70

第五章	中国古典和通俗小说在东南亚	/ 81
第一节	中国古典和通俗小说在东南亚的流传	/ 81
第二节	中国古典和通俗小说在东南亚的翻译和改写	/ 84
第三节	中国古典和通俗小说在东南亚的影响	/ 88
第六章	华裔马来语文学	/ 93
第一节	华裔马来语文学的产生	/ 93
第二节	华裔马来语文学的特色与成就	/ 96
第七章	东南亚的华文文学	/ 104
第一节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兴起	/ 104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南亚的华文文学	/ 106
第三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的华文文学	/ 117
第四节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特色	/ 125

第二编 印度文化与东南亚文学 / 129

第一章	概述	/ 130
第二章	印度与东南亚的神话传说	/ 140
第一节	印度神话概述	/ 140
第二节	印度对东南亚神话传说影响的途径	/ 142
第三节	印度神话传说在东南亚传播的共同特点	/ 145
第三章	印度两大史诗在东南亚	/ 156
第一节	印度两大史诗在东南亚佛教国家	/ 156
第二节	印度两大史诗对爪哇古典文学的影响	/ 164
第四章	东南亚的佛教文学	/ 173
第一节	佛教文学的由来与发展	/ 173
第二节	《佛本生故事》在东南亚	/ 176
第三节	佛教文学对东南亚文学的影响	/ 179

- 第五章 清迈五十本生故事在东南亚 / 184
 - 第一节 《清迈五十本生故事》的流传 / 184
 - 第二节 《清迈五十本生故事》中几个典型故事的比较 / 186
- 第六章 班基故事在东南亚 / 195
 -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家喻户晓的班基故事 / 195
 - 第二节 班基故事在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流传 / 203

第三编 伊斯兰文化与东南亚文学 / 209

- 第一章 概述 / 210
- 第二章 伊斯兰文化文学在东南亚的传播 / 219
 - 第一节 伊斯兰教先知故事 / 219
 - 第二节 穆罕默德先知伙伴故事和伊斯兰教英雄故事 / 224
- 第三章 伊斯兰文化对马来古典文学的影响 / 229
 - 第一节 马来伊斯兰王朝的历史传记文学 / 229
 - 第二节 马来王朝的伊斯兰教经典文学 / 235
 - 第三节 马来传奇故事——希卡雅特 / 239
 - 第四节 马来古典诗歌——沙依尔 / 243
- 第四章 伊斯兰文化对东南亚现代文学的影响 / 249
 - 第一节 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现代民族运动 / 249
 - 第二节 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现代文学 / 253

第四编 西方文化与东南亚文学 / 259

- 第一章 概述 / 260
- 第二章 西方文化与东南亚近代文学 / 268
 - 第一节 东南亚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过渡 / 268

第二节	东南亚近代作家阿卜杜拉·蒙希和詹姆斯·拉觉	/ 273
第三节	东南亚反帝反封建文学的先驱何塞·黎萨尔和菲律宾的 “觉醒文学”	/ 279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东南亚现代文学	/ 284
第一节	东南亚现代文学的产生	/ 284
第二节	民族资产阶级的个人反封建文学	/ 286
第三节	民族主义倾向的反帝文学	/ 294
第四节	无产阶级反帝革命文学和进步文学	/ 300
第五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新文学运动	/ 306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独立后的东南亚现代文学	/ 314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民族独立斗争时期的文学	/ 314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和两种文艺 路线的斗争	/ 320
第三节	东南亚文学在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对立统一发展中	/ 329

结束语 / 349

参考文献 / 351

影响居主导地位。东方文化的三大文化体系对东南亚文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三十年河东”时期，先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后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为什么“三十年河东”时期，东方三大文化体系会对东南亚文化文学产生直接的影响？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地缘上来讲，东南亚正处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接合部，又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海上交通的必经之道。因此，东方三大文化体系能在此地区传播先得其地理之便。其次，从民族渊源关系上来讲，东南亚许多民族的发源地是在亚洲大陆的南部地区。例如当今住在缅甸境内的民族，是从中国大陆分几批迁徙而来的蒙古人种。泰国和印支三国的民族与我国广西和云南的少数民族是同根生的民族。至于散布在马来群岛的马来族，据学者们的考证，其原始马来人也属蒙古人种，早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便已经从亚洲大陆南部迁移过来，后来在公元前200—300年又从亚洲大陆南部迁来了大批后继马来人，进一步把当地的尼格利多族（小黑人族）挤往内地。王任叔在他的《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中说：“印度尼西亚人（广义地说是指所有的马来民族——引者）应该说是‘混合种族集团’，这大概是一致的结论。这种混合从考古学方面来看，恐怕主要是由中国南下的蒙古利亚种族和存在于印度支那的尼格罗—澳大利亚大种族系统的各种族相互混合的结果。”接着他又说：“总之，印度尼西亚民族还在亚洲大陆的时候，就起源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操一种语言，拥有共同的文化。他们来到印度尼西亚之后，分居各岛屿，彼此隔绝，而在这些岛屿上又为大的山脉河流和沼泽所分隔，难于互相往来。许多世纪以来，由于自然障碍造成的分隔状态，使他们在各不相同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成为语言文化互异的各族。”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东南亚与中国有着非常深远的民族渊源关系。其三，从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来讲，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处于大大领先的地位，而东南亚属于社会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当东南亚开始出现早期王朝的时候，中国和印度早已建立起具有相当完备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国家。因此，东南亚新兴的统治阶级在新建王朝时，必然要向邻近的先进国家——中国和印度学习，借鉴他们先进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吸收他们先进的文化文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东南亚最初出现的国家和王朝都带有中国文化或印度文化的印记，看来绝非偶然，乃是上述历史条件下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其四，不同

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影响并不是平衡对等的，处于社会发展阶段更加先进的民族，其先进的文化在相互交流和影响中，总是起着主导作用。整个东南亚文化文学的发展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诚然，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对东南亚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在一个国家，谁的文化影响最大和占主导地位，这取决于该国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统治阶级的选择，同时也受不同文化性质的制约。一般来说，外来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政治渠道，一是宗教渠道。中国文化基本上不属于宗教文化，早期中国并没有为宗教服务的文化文学，也没有热心于四处传播宗教及其文化文学的僧侣和传教士。因此，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最初主要是通过政治渠道，是伴随中国的政治统治势力而来的，其影响所及也多限于中国政治势力所能到达的范围，所以在东南亚只有越南受中国文化的直接影响最深。

印度文化则不同，它主要属于宗教文化，宗教利用文化，文化为宗教服务，无论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无不如此。因此，印度文化主要是通过宗教渠道在东南亚广为传播的。宗教所到之处，其文化文学也随之而至，而宗教及其文化文学又能起精神支柱的作用，这正是新兴的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所以其传播面和影响面更加深广。除越南外，东南亚的其他国家都处在印度佛教或印度教文化的影响圈内。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虽然不像中国那样与东南亚有密切的民族渊源关系和国家关系，但印度文化文学对东南亚的影响，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却大大超过中国文化文学。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要晚得多，到13世纪以后才端倪渐显，主要也是通过宗教渠道。伊斯兰教的传播，集中在东南亚的南半部，即马来群岛地区。在伊斯兰教取得统治地位的地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便取代了印度文化的影响。而东南亚的北半部地区，如缅、泰和印度支那，则因佛教在那里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伊斯兰教难以进入，于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也就很难在那里传播，当然也就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影响可言。

宗教在传播文化方面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宗教文化之所以可以对接受这个宗教的国家直接发挥影响，是因为得到该国统治阶级的积极鼓励和自上而下的推广。他们需要宗教文化来建立王朝的上层建筑，藉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由于这个原因，印度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便占有

巨大的优势。

以上是“三十年河东”时期，东方三大文化体系在东南亚广为传播和产生影响的大致情况。从历史上看，“三十年河东”时期的东方三大文化体系，代表封建时代文化三大高峰，它们对东南亚文化文学的影响主要也是在封建王朝时期，尤其体现在东南亚的古典文学上。后来，西方国家在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后，率先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枷锁而进入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时代。以人文主义、科学、民主等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从此便进入了“三十年河西”的时期。但不应忘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以东方民族（日本除外）作为其牺牲祭品的。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轰击下，16世纪以后，东方的封建国家和王朝便逐一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东方三大文化体系的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也未能幸免。进入近现代之后，西方文化便独领风骚，主导世界文化的新潮流。对东南亚来说，西方文化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政治渠道，伴随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而来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西方文化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东南亚各国的敌视和抵制。但西方文化的冲击已无法阻挡，尤其在东南亚迈向市场经济和现代民族觉醒的时代，接受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已成为历史发展的需要。从东南亚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文化文学对东南亚的影响也就集中体现在近现代文学上。

下面就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对东南亚文学的影响作进一步的论述。

一、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与东南亚的族缘文化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爪哇、努沙登加拉群岛等地，从新石器工具的考古发掘中，已发现有两种石斧源于中国南方，可能与原始马来人的大批南迁有关。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穆罕默德·耶明在《六千年红白旗》一书中说：“锐角圆石斧和石矢等首批文物由北方流传到我国，而后传播到太平洋各岛……史前研究材料表明，这种文化影响旅行来自中国南方的云南。”在缅甸马圭发掘出来的石器也与中国周口店的石器相类似，而在缅甸瑞波出土的环石则近似于中国的仰韶文化。中国与东南亚的民族渊源关系还可以从古代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东南亚有不少神话传说与中国流传的神话传说有某些相似之处。中国人常把自

已说成是龙的传人，而东南亚许多民族也把自己的王族祖先说成是龙的后代，有的还与中国直接挂钩。在东南亚好些古老的民间故事中，也可发现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上的内在联系。例如缅甸的《貌波与老虎》、柬埔寨的《鳄鱼与车夫》、老挝的《老虎与道士》和印度尼西亚的《鳄鱼与野牛》等，在主题思想和基本情节上与中国的中山狼故事可以说如出一辙，只是主人公、地点和细节有所不同而已。更令人惊异的是，爪哇罗罗·章格朗的故事竟然与我国四川泸州一带流传的关于鲁班管驿嘴修石桥的故事在基本情节上很相似。这些故事的源头何在，现在无法考证，不过可以推断其中必有某种渊源关系。

但以上还没能说明中国与东南亚何时开始有交往。要确切说出中国与东南亚开始有交往的时间，恐怕难以办到，不过从中国的殷墟发掘中，多少还是能得到一点信息。据考古学家的发现，殷墟里有许多与东南亚有关系的动物遗骸，其中有一个刻甲骨文用的大龟甲，据专家鉴定系马来半岛之特产，中国是没有的。此外，在王陵的殉葬品中，也发现马来貘之类东南亚特有的动物遗骸，这说明早在殷代中国与东南亚就已有地区来往，但这都是史前留下的痕迹，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历史文本记载。

中国史书上有关与东南亚交往的记录始于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根据中国史书记载，越南（古称交趾或交州）从公元前2世纪起，就已正式纳入中国汉朝的管辖范围之内，从此受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一千多年，越南史书称之为“北属时期”。中国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交往也从汉朝时期开始步入正轨。最早的历史记载见《汉书·地理志》，书中提到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在位），已经开辟从中国经东南亚至印度的海上交通，并且与东南亚已有贸易往来。《汉书》卷八十三也有记载，西汉平帝元年（公元1—5年），中国已派使臣由广东乘船经越南、柬埔寨和暹罗湾，然后步行越过克拉地峡，再乘船前往印度。《后汉书》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则第一次记载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已有正式的关系。书中记载：“（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引者），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叶调”和“调便”是古爪哇的一国家和国王名。从印度尼西亚考古发现的大量汉代陶器，也可证明汉代时期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已有频繁的来往。到了三国时期，地处东南的吴国，非常重视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先派吕岱“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后又遣朱应和康泰遍历东南亚诸国进行“南宣国

化”。朱应曾作《扶南异物志》，康泰曾作《吴时外国传》，是中国最早和最完备记载有关东南亚各国情况的史书，可惜原书已佚，但其所记仍散见于《太平御览》等类史书中，或被采用于后来的齐梁史书的外国传中。以上说明，秦汉以来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已日渐密切。

但更广泛的交流，特别是文化交流，则始于7世纪的唐代。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和文化上最进步的王朝。在同一时期里，东南亚也出现了一个最强盛的王朝，那就是室利佛逝王朝。佛教在唐代的中国大为盛行，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室利佛逝王朝在那个时候，不仅是东南亚的一个贸易中心，也是一个佛教文化中心。唐朝与室利佛逝王朝之间，就是通过佛教才会有深入的文化交流，而其先驱者就是著名的唐高僧义净。他于671年乘船去印度取经，当途经室利佛逝时，即为当地十分发达的佛教文化所吸引。他在《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这部详著中，描述了他当时的印象和感受：“又南海诸洲，咸多敬信，人王国主，崇福为怀。此佛逝廓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不殊。沙门轨仪，悉皆无别。”义净当时并无久留计划，但当他看到那里发达的佛教文化及良好的学习环境，便决定多留一段时间“渐学声明”，即学习梵文。看来收获很大，所以他向有志去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提出建议：“若其高僧欲向西方为听读者，停斯一二载，习其法式，方进中天，亦是佳也。”就是说他们先到室利佛逝王朝学习一两年作为准备，然后才去印度，这是最佳方案。在他的建议下，先后有19位唐代僧人到过室利佛逝王朝和诃陵国。义净自己在完成印度取经任务之后，仍选择室利佛逝王朝作为他从事翻译和研究佛经的基地，前后住了十多年。义净可以说是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的第一个学者，他的著述已成为研究东南亚历史的重要史料依据。

如果说唐代开始出现的中国和东南亚的文化交流是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那么15世纪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时期出现的文化交流，应该说是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而第二个高潮要远远比第一个高潮波澜壮阔、气势磅礴，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登峰造极。明朝从明成祖开始，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遣使东南亚诸国，“宣示德威及招徕之意”。而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则谱写了人类航海史和国际关系史上最光辉的篇章。郑和宝船所到之处，无不受欢迎。陪同郑和的译员马欢在他撰写的《瀛崖胜览》里，用两句话概括当时备受欢迎的情景：

“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郑和每次出访的舰船都在百艘以上，人员兵马多达27000~28000人。如此强大的海上力量并不是用来侵略他国，而是为了传播友谊、维护和平与促进贸易，因此在东南亚到处流传着有关郑和的历史佳话，甚至成了神话传说。郑和留下的许多历史遗迹，至今仍被人们所供奉和膜拜。在同一时期内，东南亚也出现了空前的访华热潮，好多国家的国王亲自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例如满刺加（马六甲）王朝的第一代国王拜里迷苏刺于1411年亲自率领540余人正式访问中国，受到明成祖热烈隆重的接待。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也于1408年亲自率王后、王子和陪臣150余人来华访问。后来渤泥国王不幸在中国病故，明成祖尊重其“死后体魄托葬中华”的遗愿，将渤泥国王遗体厚葬于南京城，并下诏举行国哀。不久，菲律宾的苏禄国三王于1417年率领340余人访问中国，在访问圆满成功之后，苏禄东王也不幸病逝于山东德州。明成祖下诏将国王遗体以亲王礼厚葬于德州，并为之建造宏丽的陵寝。有关中国和东南亚友好交往的盛况，明史上都有大量的记载，这里仅举几例便足以说明，明朝时期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说，如此大规模的人员交往和由此而出现的文化交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三十年河东”时期，毫无疑问，从国家关系的深度和交往的规模来讲，印度远不能与中国相比，但是中国文化文学对东南亚的影响却大大不如印度。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文学对东南亚文学的影响仅及越南而已，因为越南有一千多年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管辖。公元939年，越南民族才第一次建立独立的封建王朝——吴朝，但仍与中国维系藩属关系，沿用中国的建制。中国文化的影响通过政权的关系已经渗透到越南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汉文是越南民族最早借用的文字，也是官方规定的全国通用文字，官方文诰都是用汉文写的。例如越南最早的文献《徙都升龙诏》，就是李朝开国皇帝李公蕴用精美的古汉文写的，被视为越南书面文学的滥觞。越南民族文学形成之初，不仅借助汉文字，也学仿汉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尤其是早期的禅宗文学。13世纪以前，越南的汉语文学已有一定的发展，作品大都出自王朝统治者和朝廷僧侣之手，其内容多涉及国事和佛教哲理。13世纪以后，越南建立陈朝，并在汉字基础上创建自己的民族文字“喃字”，从此用喃字文字写的文学作品开始跻身越南文坛，形成“喃字文学”，并逐渐与汉语文学并驾齐驱。在一个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里，越南的汉语文学仍有很强大的生命力，涌现出不少著名的作家及优秀的作品。例如黎朝开国元勋阮廌和他被誉为“千古雄文”的名作《平吴大诰》，15世纪的黎圣宗和他主帅的“骚坛会”及收集的诗集《天南余暇集》，16世纪的阮屿和他仿中国的《剪灯新话》而写出的越南最早的汉语小说《传奇漫录》，直到18世纪的著名诗人邓陈琨和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征妇吟曲》，都是越南汉语文学不同时期的佼佼者及其代表作。在同一时期里，越南的喃字文学也在历朝统治者的提倡下，迅速地发展起来。陈朝的阮诠（韩诠）是第一个用喃字写作的人，他用中国唐诗七律体写诗，开韩律诗之先河。后来越南文人又吸收民间文学的长处，创造出新的诗体叫“六八体”，尔后又从“六八体”演变成为“双七六八体”，大受文人的欢迎。十八九世纪，喃字文学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西山王朝时期又规定喃字为全国通用文字，许多用汉语创作的作家，同时也用喃字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喃字文学的代表作家首推阮攸，他用“六八体”写的《金云翘传》已成为越南古典文学中最脍炙人口的名篇。《金云翘传》根据中国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同名章回小说改写而成，虽然讲的是中国故事，但反映的是越南的社会矛盾和越南民族的思想感情，已经越南民族化，所以在越南被视为自己的文学经典著作而久传不衰。喃字文学体现了越南文学的进一步民族化，但就是在更加民族化的喃字文学里，中国文学的影响仍然非常明显。

越南文学以外，在19世纪以前，中国文化文学对东南亚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极为有限。直到19世纪以后，通过定居东南亚日益众多的华人，中国明清的古典文学，特别是演义小说之类的作品，才逐步被译介过来而大行于世，对东南亚好些国家的近现代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最早介绍中国古典小说的国家是泰国。爱好文学的泰国国王拉玛一世，于19世纪初授命宫廷作家昭披耶帕康主持翻译并改写中国著名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取名《三国》。小说一问世便大受欢迎，并由此而创立独具一格的“三国文体”，开泰国白话散文体小说之先河。《三国》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中国的其他演义小说便接着潮涌而来，据丹隆亲王统计，从拉玛二世到拉玛六世，中国古典演义小说被译成泰文的共有32部之多。关于这些中国小说在泰国大受欢迎的程度，泰国教师协会出版的《中国历史故事》（泰文版）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评语：“中国历史故事，不论哪一类，都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男女老少均爱不释手，犹如一日

三餐不可缺……”

中国古典演义小说于19世纪的下半叶，也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大为盛行，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那里的华人用通俗马来语翻译改写中国古典演义小说，一度蔚然成风。中国著名的古典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从19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被翻译改写成通俗马来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接着，中国各种的历史演义小说、传记小说、公案小说、武侠小说、民间故事等，便风靡一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翻译改写的大量实践，不仅把中国文学介绍到马来语国家，而且还造就了大批的华裔马来语作家。他们用通俗马来语创作了大量的近现代文学作品，深刻反映了当地社会在殖民统治下的现实生活和各种矛盾。这就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马来语地区出现的独具一格的华裔马来语文学。这个文学受到来自中国、本地和西方三方面文化文学的影响，具有“三合一”文化的特色。它弥补了马来语文学近代发展历史上的一段空白，尤其是对促进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荷兰学者德欧教授后来也承认华裔马来语文学“是通往现代印度尼西亚文学的发展链条中的主要一环”。

中国文化对东南亚文学的影响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培育出东南亚的华语文学。20世纪初，东方普遍出现民族觉醒，东南亚的华人也积极支持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时，一些受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迪和鼓舞的华人知识分子，开始用华语从事新文学的创作。从1919年10月起，新加坡《新国民日报》的副刊率先刊登具有新思想和新精神的白话文作品，成了东南亚以新加坡和马来亚为中心的华语文学的发端。1925年以后，开始出现纯文艺的刊物如《南风》、《星光》等，积极提倡新文学运动，发表了比较成熟的作品，其中以南洋华人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多，后来提出“把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去”的口号。1927年之后，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受“宁汉分裂”的牵连而避难新马各地，他们的到来又为新马的华语文学增添了生力军。而这时期出现的“南洋新兴戏剧运动”也为华语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因此，从1925年到1931年这一段时期，有人称之为新马华语文学的扩展期。1937年，中国爆发全面抗日战争，东南亚华人积极响应，投身到抗战救国的洪流中去。从上海南下的一批文化人，特别是1938年郁达夫等著名作家的到来，给新马的华语文学带来勃勃生机。1938年春正式提出“南洋抗战文艺”的口号，抗战小

说大行于世，是华语文学的繁荣时期。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便占领了整个东南亚，一度高涨的新马华语文学从此沉寂下来。

东南亚的华语文学以新马地区最为发达，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也都兴起过华语文学之风。二战前各国的华语文学尽管各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和成长过程，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属于侨民文学，因为那时还存在双重国籍问题，东南亚的华人大多认同于中国，以华侨自居。东南亚华语文学的发展几乎与中国文学的发展同步，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海外伸延，有人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带有侨民性质的东南亚华语文学曾经有过一度复苏，但进入50年代后，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纷纷独立和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原来的华侨绝大部分都转变成为所在国的华裔公民。至此，侨民性质的华语文学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往后的华语文学便与中国文学彻底分道扬镳，成了所在国家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印度文化的影响

印度与东南亚早在公元前就有了交往，但印度自己的古文献很少提到东南亚。古希腊地理学家脱烈美在公元前165年或更早写的《地志》，已提到印度南部的三个港湾与金洲（一般认为是马来半岛）之间有贸易来往，同时也提到一个叫耶婆提的地方（一说今之爪哇，一说今之苏门答腊）。大约在公元1世纪，印度的宗教势力开始深入到东南亚地区。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向印度东南部扩张势力，战争逼大批南印度人逃往东南亚。其中有婆罗门和刹帝利贵族，他们利用宗教和婚姻关系与当地新兴的奴隶主阶级相结合，建立了一些印度化的小王朝。据考古发现和中国的史书记载，在东南亚早期出现的国家大都信奉婆罗门教，但佛教也伴随而来。例如中国史书上提到的扶南（柬埔寨）、林邑（占婆）和沿马来半岛由北向南的顿逊、屈都昆、拘利等都是印度化的王朝。扶南曾以湿婆教为国教，但也流行佛教。在加里曼丹发现4世纪用南印度的拔罗婆文写的碑文，记载了古代国王赐众婆罗门两万头黄牛的事迹。在西爪哇多罗磨王国遗址，也发现4世纪用拔罗婆文写的碑文，记载国王赐众婆罗门一千头黄牛的事迹。中国东晋高僧法显在《佛国记》中也提到他滞留耶婆提（今之爪